

社会科学方法论
跨学科的理论与实践译丛

丛书主编 应奇

解释学哲学中的 语言学转向



*The Linguistic Turn
in Hermeneutic Philosophy*

克里斯蒂娜·娜丰 (Cristina Lafont) 著
何松旭 朱海斌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社会科学方法论

跨学科的理论与实践译丛

丛书主编 应 奇

解释学哲学中的 语言学转向

*The Linguistic Turn in
Hermeneutic Philosophy*

克里斯蒂娜·娜丰 (Cristina Lafont) ©著

何松旭 朱海斌©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解释学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 / (德) 克里斯蒂娜·娜丰 (Cristina Lafont) 著. 何松旭, 朱海斌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9. 7

书名原文: The Linguistic Turn in Hermeneutic Philosophy

ISBN 978-7-308-19147-0

I. ①解… II. ①克…②何…③朱… III. ①阐释学
IV. ①B0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86163 号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1-2016-138 号

解释学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

克里斯蒂娜·娜丰 (Cristina Lafont) 著
何松旭、朱海斌 译

责任编辑 陈佩钰 (yukin_chen@zju.edu.cn)
责任校对 严莹
封面设计 卓义云天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版 杭州隆盛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23.25
字数 300 千
版印次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308-19147-0
定价 8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盛晓明 童世骏 郁振华 张庆熊 张旺山
陈嘉明 冯钢 韩水法 刘擎 罗卫东 渠敬东

Philip Pettit Stephen P. Turner

James Bohman Gunnar Skirbekk

丛书编委 (中文人名按姓氏音序排列)

丛书主编 应奇

“社会科学方法论：跨学科的理论与实践”译丛

总 序

主要由马克斯·韦伯的同名工作确立其卓著声誉和研究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其学理层面的渊源其实应当追溯到新康德主义者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对于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之异同的方法论辨析,而其规范层面的驱动力则是由早期现代性向晚期现代性过渡中呈现的社会科学地位问题所折射出来的现代社会对于社会和人想象的转换。就这个研究传统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展开而言,从实证主义向后实证主义的转变是特别值得重视的,正是这个转变及其产生的持续效应,不但破坏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固有的、本质主义的区分,而且推动了社会科学之研究逻辑从聚焦于行动、理由和原因到聚焦于规则、合理性和说明的转化。如果说,后实证主义转变所促成的历史和实践的转向已经把社会科学置于当代科学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的中心,那么居今而言,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个本是由跨学科的问题意识所衍生的理论问题本身却已经泛化成了一种跨学科的实践,一个只有通过与社会科学的合作才能完成的计划。

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个论题下的著述,国内学界多年来一直都不乏关注,例如,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的《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温奇的《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

系》，都已经有了中译本，有的还不止一个译本。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套大型的译丛，能够按照这个研究传统本身的脉络，系统地呈现其发展演变至今各个阶段和流派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本译丛将紧紧围绕这个论题的跨学科特质，甄选以下三个层次或方向上的重要著述，请国内学有专长的成熟译者精心翻译成中文出版：一是在元理论层次的工作，我们将遴选近百年来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的经典之作，同时将把目光投注于当代最前沿的工作；二是跨学科意识和方法论在某一门或若干门具体人文社会科学中得到集中体现的成果，例如行为主义与后行为主义之于政治学形态的变化，理性选择理论之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适用性，交往行动理论在伦理学和法学上的运用；三是具体的跨学科实践，这方面的重点将是那些无论在方法论上还是在规范含义上都具有示范作用的具有广泛影响的个案研究。

目前入选的著作旨在集中展现后实证主义转向对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的塑造性影响，这是长期以来国内西学译介中的一个巨大盲点。从理论基础而言，后实证主义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哲学家奎因对于经验论之两个教条的著名批判，而其基本的理论信条实际上可以追溯到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这种转变明显地影响到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探讨路径，例如目前几乎已经成为经典作品的温奇的《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就是把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观念推广到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上的一个典范。就社会科学哲学这个领域而言，温奇的著作得风气之先。正是在上述转向和潮流之下，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个理论问题本身逐渐衍化成了一种跨学科的实践，这不仅是指，后实证主义所传递的方法论意识迅速辐射和渗透到各学科例如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研究当中，超越和突破了实证主义的藩篱和局限；而且是指，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其核心部分就是所谓社会科学哲学）本身成了凝聚和整合跨学科研究成果的一个平台。

多年来，浙江大学在跨学科研究上做出了持续的投入，也获得了

相当的声誉。得到浙江大学文科高水平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支持，目前设计的这个译丛既真实地反映了我们对于跨学科研究之重要性的认识，也希望能够自觉地回应已经蓬勃开展的跨学科实践。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试图通过这个译丛努力呈现跨学科理论与实践背后真实的问题意识，使得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个看似边缘的论题成为人文社会科学最新进展的聚焦点；同时也将通过这个译丛自身的立意、宗旨和品质，塑造和确立它在国内蓬勃开展的西学译介事业中的独特地位。

应 奇

2016年3月

英文版前言

关于解释学哲学中语言学转向研究的一个早期版本出现在1993年的西班牙。自那时起,我就开始注意到了由这个最初的研究而自然而然产生的许多后续问题。然而,要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则不可避免地会超出原本任务的框架;因此,以下的内容就是要试图展示一个更宽泛的框架是如何从最初的研究中衍生出来的。

我最初的计划是对语言哲学的德国传统中出现的语言学转向所表现出的典型特征和问题进行分析。^① 这个转向可以被视为起源于所谓的哈曼-赫尔德-洪堡传统^②,在海德格尔那里得到了更深一步的

^① 通过“德国”这一传统特性,我将其与本世纪的语言哲学的其他主要传统区分开来,我把其他主要传统称为“英美”(Anglo-American)。诚然,就学者的国籍和她的作品的效果历史(Wirkungsgeschichte)之间的可能分离而言,这样一个关于传统的标签是有问题的。“英美”这个名称会造成一些误解,尤其是对被弗雷格、卡尔纳普、维特根斯坦这样一些学者们所深深影响着的传统,都会产生误解。然而,当我们考虑到这些思想家们作品的效果历史时,这个标签看起来就合适多了,至少与那种想要把有着自己传统的各个不同的学者归入到有同一个哲学观点的大标题下的想法比起来,问题就少了许多。当“英美”这个术语不仅仅包括了一个传统的分析时期,而且还包括了它的后分析时期时,在我们这个时代,找到恰当的哲学标签的困难可想而知。标签“德国”就必须既要包括解释学的传统(以及它的前身),还要包括批判解释学的传统,也同样如此。

^② 作为对前面脚注中所提出的找到恰当的哲学标签的困难的解决方案,查尔斯·泰勒(1985)将这个语言哲学的传统叫作“哈曼-赫尔德-洪堡传统”,现在,这个名称已经通行。

发展和激进化,然后又在伽达默尔那里将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对同一时代的阿佩尔和哈贝马斯等学者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这一德国传统展现了一些特殊的特征,这些特征能将其与英美的语言哲学清楚地区分开来。或许其最重要的特征就在于这样一种明确的企图,即以语言的交往功能(语言作为理解的手段)为代价,破除把语言的所有功能都同化为语言的认知功能(语言作为知识的工具),这样的企图出现在这个传统的所有学者的著作中。换言之,这个传统的主要目标就是结束洪堡所说的“逻辑优先于语法”,在此传统中的学者把这个优先性追溯到希腊哲学最初始时期。这个传统的基本方向是面对社会和文化现象,而不是自然现象(也可以说是面对社会科学而非自然科学),这也解释了学者们的共同动机。与这个中心相一致,德国传统总是会将重点放在对自然语言的分析上,并且会将这些语言视作对世界整体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构造作用。也就是说,这一传统对语言分析的哲学兴趣并不只是起源于语言在人与客观世界关系间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通过允许人类拥有这个世界的命题性知识)。毋宁说,语言在人与社会性世界之间的关系中起着关键作用(而语言则本质上依赖于主体间的交流),而且对我们在这个主观世界里所拥有的经验也起着关键作用(这种经验也只有通过语言学上的分说才能得以表现)。这样,语言在其多维的世界一展开功能中得以被思考。

xi 然而,在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时,德国传统和英美传统之间最先出现的明显的区别已经不再是那样。看得再深入一些,我们就会在它们的基本趋势中以及开始将两个传统都作为它们自身内部发展的结果的困难处,发现一个明确的交汇点:语言学的相对主义、不可通约性、意义整体论等。尽管这样一个交汇点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如果将德国传统与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它的后分析阶段)英美的语言哲学进行比较,那么要是没有两个传统中语言学转向的共同基础,

这个交汇点也不会产生。

尽管本书只是直接讨论对德国传统的分析,但是我们识别出它和英美哲学进路之间的共同关联也极其重要。这一点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我的分析的系统性目标,这也许最好地回答了以下问题:上一段中提到的困难是**这种语言学转向本身的结果吗**,即它们是单单这种转向就可以解决的难以克服的问题吗?或者说,它们只是源于进行转向的一种独特方式,从而或许可以通过修正一些事先未受质疑的预设的方式来避免它们?我比较倾向于怀疑后者,其原因还是要感谢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一种英美哲学潮流——也就是所谓的直接指称理论^①。这个新进路让我相信,在无需宣布放弃这种语言学转向的情况下,避免一种极端语言学相对主义的结果是可能的。

简言之,现代语言哲学中两种语言学转向的共同基础,可以在每种转向的代表性人物所提出的方式中找到:德国传统的洪堡和英美传统的弗雷格。这两位学者都通过援引**意义和指称之间的区别**,发起了他们的语言学转向(几乎没有别人可以替代他们)。也就是,他们意识到与其他符号系统比较起来,语言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使得以不同的方式指称同一个事物成为可能。^②但除此之外,两位学者都将这个区别建立在了**同样的方式上**,尽管此举并不明显:他们一般化了意义一指称的区别,认为它对**一切语言学符号都适用**(甚至是专名)。这样一来,他们就获得了这个一般性论题:**意义决定指称**。

xii

但是,将这一论题不加限制有效地接受下来,导致了致命的哲学

① 比起“指称的因果理论”这个术语,我更倾向于“直接指称理论”这个名称,不仅仅是文体上的。正如我试着在第五章中所要表明的内容,捍卫这些新的指称理论的关键洞见并没有要求,甚至没有暗示过对指称的因果解释的接受,或者是对形而上学的实在论的接受。

② 与其他符号系统比较起来,恰恰是因为语言不但使我们可以给事物命名,还让我们可以将它们分类(也就是将不同的事物归入一个术语下,并且将同样的事物归入不同的术语下),所以,这就展现了语言的**世界一展开功能**。也就是,语言让我们对世界有了一个一般性的解释(和一般性的命题性知识)。就这项功能是首先使语言在哲学上令人信服的东西而言,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语言重要功能的支持,语言学转向是不会发生的。

后果。只有当意义决定指称这种主张——从严格的语义学的观点看几乎是无害的——负担了认识论任务时,这些后果才变得明显。然而,考虑到之于其他的研究对象来说,语言已经不再被简单视为一种研究对象,而且被视为解决哲学问题的一般性范式,那么这种语言学转向似乎就需要这样一种负担。在这样的情况下,意义决定指称的论题就暗示出,不同的语言表达通过它们不同的意义,决定了我们(认识论上)通达它们的所指物。也就是说,语言表达被认为,如果不是决定了有什么的话,那么至少决定了对语言共同体来说能有什么——或者这个共同体能说(也就是相信)有什么。从这层意义上说,语言最主要的功能被认为就在于它的世界一展开能力上。因为,正是这种能力,使得在哲学语言保护下对所有哲学问题进行重新阐释的尝试可被理解。这同样也说明了,为什么语言学转向和意义决定指称的论题实际上是一样的。或者至少我们可以说,它说明了,为什么多年来意义决定指称的论题在两种传统中一直被视为不证自明,并且只有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它在英美哲学语境下才成为问题。

一旦意义决定指称这个论题与自然语言的多样性和偶然性这个事实结合起来,并且与它们特有的世界观结合起来(用洪堡的话来说),那么该理论所带来的致命后果就会变得尤为明显。因为这样的结合必然会对世界客观知识的可能性以及不同语言之间主体间交往的可能性造成严重问题。如果对于不同语言的言说者来说世界“能有什么”完全不同,如果他们不能谈论同一个实在,那么,他们要怎样进行交往呢?更糟糕的是,这些人要怎样获得关于实在的某种知识呢?

然而,与意义决定指称这一论题相关的问题并没有在同样的方式上决定两个传统的发展。最主要的不同就在于,洪堡以及整个德国语言哲学总是对自然语言的分析很感兴趣,并随着偶然的历史过

程而发展；相反，弗雷格根据莱布尼茨的完美语言理想来进行工作，完美语言是一门通用语言(*characteristic universalis*)，他的观点依然紧紧围绕着构造一门人工语言的修正计划展开着，因此，在弗雷格那里并未以明确的形式出现在捍卫自然语言中意义决定指称这一论题中所隐含的问题^①。两个传统的平行走向，尤其考虑到语言学相对主义问题的时候，只在后来的观点中才变得清晰：也即在那时，英美传统在它的后分析阶段放弃了完美人工语言的理想。这样，它就会对自然语言本身所具有的难以克服特征敏感起来，从而也就会对意义整体论的这个成问题的含意敏感起来。

XIV

这两种传统背后的相似性鼓励着我追求一种特定的研究路线：对意义决定指称这一论题的质疑——由直接指称理论的捍卫者所开启的一项挑战——是否也能在其他地方被证明是富有成效的，我打算对其进行检验。尤其是，我想知道这一质疑对于识别和疑难德国传统特有的语言的具象化(语言的观念论)的来源是否起作用。

当然，发展一种直接指称理论的各种尝试还没有为一般性指称提供一个全面说明。但是，他们对于意义决定指称这一论题的质疑——所有这种努力共同点——已经走在削弱两种传统中由语言学转向导致的相对主义和不可通约性后果的道路上。正如我试图在本书最后所要展现的一样，这一分析削弱了自然语言所谓的决定性和限制性特征，并且它也帮助我们认识到了语言的使用与我们认知的能力内在关联的系统性方式。这样一个洞见使我们识别出把意义与指称之间语义学区分认识论化后所产生的谬见。此种做法混淆了明显的事实与声称的事实：明显的事实是，我们对所指物的摹状词(通过我所使用的语词的意义)表达了我们对它们事实上的信念；

^① 确实，在《意义与指称》(*Über Sinn und Bedeutung*)中关于专名的著名脚注中，在将它应用于自然语言的时候，弗雷格预见到了与意义决定指称这个论题相关的问题。但是他却只是将这些问题视为他修正计划的进一步论证，也就是，视为通过为科学建立一种完美的形式语言来避免自然语言的模糊性这一需求的进一步论证。

而声称的事实是,我们的摹状词因此而决定了它们指称何物。前者的假设是由于这个寻常的真理,“我的知识的限度就是我的世界的限度”(也就是,我相信这个世界会是如何的限度),而后者则引发了一个神话,“我的语言的限度就是我的世界的限度”(也就是,我能谈论的这个世界的限度)。就后者的主张超出了前者而言,就我们把只能指称与我们的信念相符合之物置于规范性意义中而言,后者犯了一个错误。一种特定语言的表达通过它们的各种意义可以决定我们(XV (认识论上)通达所指物。正如之前所指出的那样,它们甚至可以决定一个语言共同体能够说出有什么东西。但它们却不能决定这个共同体思考为它的信念所及的东西:它们不能决定这个语言共同体能够指称什么东西。

正是借助于语言的指称功能,通过使我们能够指称不依赖于我们构想它们的方式的事物,语言使我们超越了我们信念的局限。也就是说,它让我们甚或迫使我们¹将所指物当作是在逻辑上不依赖于我们构想它们的独特方式的事物。当我们学会了语言表达的指称性用法时,我们就学会了,这些表达的真正所指物不可能被还原为碰巧满足了我们的摹状词的某个东西。此物不可能是我们所指称的东西,不论我们的知识多么合理;它迫使我们认识到,那些组成了我们所断言的关于它们知识的所指物的摹状词,可能是错误的。只有这样,言说者才能指称同一个事物,即便他们就这些事物应当如何被摹状有分歧。毋宁说,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有分歧,从而互相学习。

语言不仅仅在我们对世界的解释性通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还在我们对世界理解为逻辑上不依赖于任何一种构想它的独特方式中扮演着同样关键性的角色。通过学习语言的指称性用法,我们恰恰学会了这种不依赖性。因此,关于指称活动的实践关涉到对单一客观世界的形式化预设,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解释可能会不同。如果没有这样一个预设,正如我试图展示的,那么理性讨论和集中学习的整个实践都会全盘崩溃。

然而,由此立马引发的问题是,怎样给出与语言的谓述功能相一致的语言指称性功能一个说明。换句话说,这里的挑战是要在没有否定语言的世界一展开功能的情况下,对语言的命名功能所强调的**实在论**直觉(知识的客观性、可错论等相关的认识论直觉似乎依赖于这种直觉)给出一个说法。在不诉诸那个否认我们与世界之间具有不可避免的**解释性**关系的形而上学实在论的情况下,我们要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xvi

在这里恰恰很难依赖英美传统。因为如果有可能在一些“直接”指称理论的版本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普特南的“**内在实在论**”,这是本书特别倚重的)找到**回应**这一挑战的努力,那么,也会有**避开**这一挑战的理论版本。后一种关于“直接”指称的理论倾向于依赖因果主义、自然主义或者是形而上学实在论的策略。在我看来,所有这样的策略都注定会使语言学转向**作废**,并且同时放弃了大量我们从对我们与世界间的不可避免的**解释性**关系中已经学习到的东西。

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利用德国传统语言哲学中的资源。多亏了这个传统中强烈的观念论倾向,解释的因果主义策略——实际上,任何一种自然主义——才都与之相去甚远。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这里引发的问题恰恰是相反的。正如我将试图展现出来的一样,这个挑战是要保卫一种**实在论**的视角,这个视角可以说明指导我们认知和交往活动的规范性预设;与此同时,把这个视角整合进入同样也可以说明这些活动的**解释性**和**创造性**特征的一般**实用主义**策略中。

这一语言观充当了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的基础,我对此的分析就是为了来回应这个系统性挑战。因此,就其不只是一种重构而言,这个分析不像这本书中其他的分析,这是因为哈贝马斯的观点在德国传统中具有突出地位。

一方面,哈贝马斯观点中的精妙特征和系统雄心使他对语言的

xvii

分析远比这里其他人的分析要复杂。毫无疑问,这是因为他的交往理性理论的涉及范围很广。另一方面,哈贝马斯的进路也是在德国传统中唯一一个**明确**试图反对各种形式的相对主义而捍卫普遍主义或理性主义观点的进路。正因如此,为了分析我研究的核心位置中这个系统问题,他的理论就是这个传统中很自然的位置。^①

此外,哈贝马斯观点之于这项研究的重要性,还在于特别结合了他从一开始就已经在使用的各种理论策略。这里提供的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理论的分析依赖于这样一个确信:在这个理论中,两个不同策略之间有一种张力关系。第一个策略是坚决地反实在论、建构主义特征。第二个策略是将实在论因素纳入一般实用主义策略中;顺着普特南,我称之为**内在实在论**。按照至今的发展,哈贝马斯的理论的确包含了两个策略的要素。我确信,只有后一种策略才能对普遍主义进路提供足够的支持。因此,我对哈贝马斯的语言哲学的最初的分析主要集中在首要的批判性任务上:我将主要质疑某种反实在论策略的可行性,哈贝马斯已经把这种策略作为完善他的交往理性理论的一种可能方法。

xviii

自从这本书的西班牙语版本出版发行起,我不断遇到如下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实在论策略才能够像在第一版书中一样,在哈贝马斯自己理论的框架中,能够被有效整合且前后连贯地发展呢?也就是说,在多大程度上,这个策略才能说明哈贝马斯的理论所要解释的一切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在英文版中又新加入了第三部分,我想在

① 当然,另一个需要我们考察的自然位置应该是阿佩尔的语言观,从他的观点中,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获得了决定性推力。但是由于两个观点的复杂性和系统性的宽度,对阿佩尔进路的检验就需要在其自身立场上进行独立的分析,这是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此外,由于两位学者对于一些理论策略的偏好的相似性(如对于真理的反实在论概念),对于哈贝马斯进路的某些批评对阿佩尔进路也同样适用。然而,关于语言的命名性用法背后的规范性预设的承认(对于我的批评来说是基本的),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因为阿佩尔已经明确用跟我相似的方法分析了“直接”指称理论。不幸的是,我在这本书快要完成时,才注意到间接支持我的分析的这个资源。

其中迈出建设性的一步。与其他章节所介绍的变化比起来,这需要
对这一研究初始的范围有一定程度上的推进和超越。一方面,这一
步有着明显的系统性目标,由此这两种语言哲学传统之间的区别变
得毫不相关。另一方面,想要通过内在实在论策略来发展哈贝马斯
全部交往理性理论的可行性,就要站在整全性的要求之下。不论多
么粗略,为了解开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的有问题的关联,就需要
走到语言哲学的领域之外。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在我研究上
附加的部分,也只是代表了对我最初提出的问题的永无止境探索的
另一步:理性和语言之间的联系是什么?

我要感谢格雷厄姆·哈曼对这本书的出版提供的不可或缺的帮助。

目 录

第一部分 德国语言哲学传统中的语言学转向

引 言	3
第一章 哈曼对康德的批判:语言作为我们与世界 关系的构成者	5
第二章 语言的构造性维度:根据洪堡	13
第三章 哲学解释学的语言观	50

第二部分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中的语言概念

引 言	109
第四章 语言作为理解的媒介:语言的交往用法	115
第五章 语言作为学习的媒介:语言的认知用法	206